

## 主持人语

苏格兰“脱英”的可能性，在如今这个混乱纷争的世界上，似乎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这是个严峻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应该引起注意。其之所以重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 苏格兰和英格兰联合成为一个国家，已经有 300 多年历史，如果这样的联合也可以分手，会引起人们对“国家”问题的重新思考。2) 一旦苏格兰“脱英”成功，爱尔兰差不多也会跟着走，那么“英国”也就解体了；英国这样一个老牌的现代国家、第一个工业强国和曾经的第一大帝国一旦解体，会对整个世界造成巨大的冲击，其影响如同古代的罗马帝国崩溃一样。3) 苏格兰一旦“脱英”，对世界诸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是巨大的刺激，混乱的世界会变得更混乱，许多国家会出现麻烦。4) “英国”一旦解体，英格兰就回到五百年前都铎王朝开始扩张时期的英格兰了，五百年黄粱一梦，真是历史的讽刺！

可是，苏格兰会不会“脱英”、能不能“脱英”呢？这就是本期工作坊讨论的话题。

高岱回顾了英格兰和苏格兰两个地区历史上纠葛的过程，尤其分析了两地联合后的一些情况，他认为，几百年的联合使相互的认同已比较强大，因此在短期内“脱英”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李丽颖介绍了 1707 年两地联合的历史背景，她指出：当时，苏格兰政治家为了苏格兰的繁荣安定而放弃国家主权，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任何理论、任何主义都应该为现实服务，使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民族主义才是好民族主义。

陈晓律把苏格兰“脱英”和英国脱欧公投联系起来讨论，他认为这两个看似无关的问题，其实反映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个共性现象，即用“公投”这种貌似“民主”的手段解决国家主权问题，只能造成灾难性结果，并且是政治家“滥用民主”的不负责任的表现。进而，现在西方很多学者对民族问题的研究，更多的是刺激了民族分离的倾向而不是加强民族团结，这个现象应引起高度注意。李济时认为 2014 年苏格兰关于“脱英”的公投以失败告终，是由于多数苏格兰人以“留欧”作为“留英”的前提；现在英国既然公投脱欧，那么苏格兰留英的前提就消失了，因此苏格兰脱英的话题就被再次提出。

孙坚认为，公投作为直接民主的一种形式，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逐渐被英国宪制接受。英国宪政的一大特色是因循惯例，然而对公投是否应成为惯例，英国存在不同意见。苏格兰分离运动经过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及独立公投两个阶段，实现分权后的苏格兰分离进程发生了质的转变，苏格兰独立从分离主义者遥远的梦想转变为真实的政治进程。李冠杰认为苏格兰民族党（SNP）到 2016 年已经过了巅峰期，独立的诉求也遭遇挫折。但英国“脱欧”给它带来新的机遇，它会利用这个机会，以苏格兰人民在脱欧公投中选择留在欧盟为理由，寻求第二次“脱英”的可能性，因此，“被”脱欧成为苏格兰独立派推动二次公投的有力武器。

傅聪对英国“脱欧”后苏格兰“脱英”的可能性做了评估，她指出：2014 年独立公投时，英国所有的建制派，包括主流大党、金融机构、大型企业和媒体都坚定地反对苏格

兰独立。但在英国脱欧后，苏格兰工党、自民党开始支持 SNP 参与脱欧谈判的策略，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也愿意看到一个加入欧盟的独立的苏格兰国而非退出欧盟的英国，这些因素将成为苏格兰脱英的重要变量。郭泉认为：SNP 建党以来，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经历了“亲欧-疑欧-再亲欧”的演变过程，作为以独立为目标的政党，SNP 对欧态度从根本上而言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SNP 将英国与欧洲视为苏格兰的两个“联盟”，为实现其最终目标，SNP 不断在两个“联盟”、两种身份中进行权衡与选择。胡莉的观点颇有新意，她认为：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苏格兰民族运动兴起至今，某种程度的自治是苏格兰的主要诉求，英国政府也付诸过实践，但鼓吹独立的 SNP 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他们借助苏格兰对地方自治的某种需要，抓住一切机会推行独立，在一定意义上，“独立”是 SNP 鼓吹出来的。现在，SNP 已站稳脚跟，在英国脱欧的背景下，各种内外因素充满变数，因此，苏格兰脱英已经是一个可能的选择。

钱乘旦

2018 年 9 月 30 日

## “博雅工作坊”第11工作间

### 苏格兰的未来：“脱英”还是“留英”？

2018年9月14日

2018年以来，随着英国不断加快正式“脱欧”的步伐，试图留在欧盟的苏格兰宣称，将视“脱欧”结果决定是否举行二次公投。苏格兰再打“脱英牌”意欲何为？由英国“脱欧”引发的连锁反应将会给苏格兰、英国乃至欧盟带来怎样的影响？9月14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雅工作坊”第11工作间围绕苏格兰的未来：“脱英”还是“留英”？主题，邀请10名专家学者从历史、政治、政党、国际关系等角度对苏格兰民族分离运动、其与英国关系的发展及苏格兰是否会通过公投脱离英国等问题进行了一场跨学科的学术讨论。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在致辞中指出，北京大学成立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目的是推进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研究院成立以来，已成功举办了10期博雅工作坊，工作坊以一种更加注重实效和观点碰撞的交流方式对世界特定区域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苏格兰问题”由来已久，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希望通过讨论，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岱首先发言，题目是《历史与现实之间——英格兰与苏格兰关系的历史探析》。他表示，对于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关系，曾有观点认为，苏格兰是英格兰殖民地的一部分，类似于印度在英国的地位，一旦有机会

进行公投，苏格兰的民族主义就会迸发，不少媒体也将公投称为“苏格兰殖民地将要独立”。实际上，这种观点存在误区，苏格兰并不是如印度类型的殖民地，其与英格兰有着特殊的关系。

据介绍，苏格兰位于英格兰北部，三面环海，北、西与大西洋交界，东临北海，南端则以索尔威湾、契维特高地及特韦德河和英格兰为界，面积 77,000 多平方公里。苏格兰地形分为高地区与低地区，爱丁堡市和格拉斯哥市以南为河谷平原与丘陵地带，称之为低地区；以北则是冰河时期形成的山脉与湖泊，称之为高地区。苏格兰人口约 512 万，第一大城市格拉斯哥有 70 万多人，是苏格兰的工业重镇；第二大城市爱丁堡市人口 50 万多人，是苏格兰自治政府所在地，也是苏格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苏格兰最早的居民是欧洲大陆的凯尔特人。罗马人统治英格兰时，苏格兰是罗马帝国的化外之地，并非其统治部分，直到诺曼征服前后，英格兰和苏格兰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缓冲区”，大约北至福尔司河，南到特威德河，11 世纪中期，两河之间的地区被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二世所控制。1066 年，威廉一世进入英格兰后，许多诺森伯里亚人逃到这一地区避难，其中包括埃得加王子的姐姐玛格丽特，不久后，她便与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坎莫结婚，通过这次婚姻，玛格丽特加强了英格兰对苏格兰政治和文化的影响。1314 年，苏格兰取得班诺克本战役的胜利，为独立奠定基础。1328 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签署“爱丁堡-北安普顿协议”，英格兰放弃对苏格兰的控制，但同时，英格兰国

王爱德华三世许诺妹妹与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布鲁斯年仅四岁的儿子大卫进行政治联姻。至 16 世纪初，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四世迎娶了英格兰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之女玛格丽特，此后斯图亚特王朝的后裔也同时有都铎王朝的血统，为詹姆斯六世入主英格兰奠定基础。1603 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驾崩，其外侄孙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继任成为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英苏两国共戴一主，但政府各自独立运作。长期敌对的英格兰与苏格兰两国成为共主联邦。1707 年，苏格兰和英格兰共同签署《联合法案》，苏格兰议会与英格兰议会合并为大不列颠议会，改称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高岱表示，英、苏联合后遇到了不少棘手的问题。一是组成联合王国政府后，一些原来只在英格兰征收的赋税也开始在苏格兰征收，逃税与走私行为出现并日益增多；二是“光荣革命”后，支持被废黜的斯图亚特王朝君主詹姆士二世及其后代夺回英国王位的保王党人在苏格兰支持者甚众，他们对英国当时王室合法性提出质疑，对英苏联合的稳定和持续形成很大挑战；三是联合后的王国政府所表现出的较为浓厚的英格兰色彩也引发了苏格兰人的反感，不仅苏格兰人一时难以适应成为“英国人”，英国也不太习惯真正把苏格兰当成自己的一部分。

然而，这些挑战并未影响到英苏联合的维持与稳定，这主要是因为联合后的英国政府在 1707 年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先后在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维护英苏关系发展的措施，使“联合”逐步得到苏格

兰社会各阶层的接受，“不列颠认同”意识也随之在苏格兰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这些措施包括：宗教上不触及长老会教派的利益；经济上将苏格兰纳入帝国的庞大体系；政治上理智地为苏格兰保留了一部分处理自身事务的权力，争取到苏格兰社会精英阶层的支持；改善交通状况，加强地区间的沟通，利用城市化的发展灌输联合王国的共同意识。与此同时，建立君主制、合编英苏军队、联合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也是促使英苏联合得以维持的三个重要因素。

高岱指出，需要强调的是，1740 年至 1800 年期间在苏格兰发生的启蒙运动对加强“不列颠认同”发挥了积极作用。不同于法、德等欧陆启蒙运动，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一场政治转型和宗教改革已然完成的“后革命启蒙”。《1707 年联合法案》通过后，随着大英帝国的快速扩张，苏格兰本土进行了一场哲学思想上的反思，诞生了数量众多的思想家，这使得苏格兰这个西欧最为贫穷、偏远的国家引起了世界的注意，迅速成为欧洲文明的一股强大势力。到 1750 年时，苏格兰人是当时欧洲最有教养的市民，识字率高达 75%，涌现出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哲学家大卫·休谟等一大批杰出人物，对欧洲甚至世界近代史发展有过相当重要的影响。随着历史的推进，包括建立全国统一的邮政通讯系统、成立英国广播公司（BBC）、实行矿业和铁路国有化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福利保障系统等事件都对英苏联合的维持与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

然而，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已近三百年的英苏联合的稳定局面开始出现松散化的发展

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大英帝国的瓦解不仅直接影响了联合王国很多海外投资商的切身利益，也使“不列颠认同”失去了重要的心理基础；其次，延续了数百年的联合王国军队合编制此时也发生了分离的倾向。随着战功赫赫的苏格兰军团被解散，苏格兰人的民族自尊无疑受到了严重打击；第三，1998年英国议会通过“苏格兰法案”，恢复了苏格兰议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苏格兰人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也使苏格兰人逐渐重新产生了一种脱离于“不列颠认同”的民族意识。2007年，致力于苏格兰完全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SNP）在大选中以微弱多数成为议会第一大党，4年之后 SNP 取得议会多数席位，党魁萨蒙德成功组建多数派政府，与英国首相卡梅伦关于苏格兰独立公投的谈判也正式开始。

高岱认为，英苏联合经历了三百多年的风雨历程，期间苏格兰在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宗教信仰以及社会与文化的融合等重要方面都与英格兰结成了紧密的联系，“不列颠认同”在苏格兰也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尽管近年来英国社会出现了苏格兰与英格兰相分离的呼声，但分离并不会在朝夕之间就成为现实，除非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于同一时间发生全面的冲突，才有可能导致二者分离，如果只是在某一个时期或某一个方面发生冲突，即便是出现危机，短时间内也不会造成英苏联合的解体。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丽颖的发言主题为《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

据她介绍，1706年英苏双方开始就合并问题展开谈判，



之后，是否与英格兰合并由苏格兰议会投票决定，议会先就合并草案逐条投票、修改，再就修改后的法案进行一次性投票，最终赞同与英格兰合并。1707年3月25日，苏格兰议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意味着苏格兰的独立主权行将结束，当时苏格兰议会领导者之一昆斯博瑞公爵满含泪水说，合并是为了苏格兰及其子孙后代的利益。

自11世纪中期威廉一世入主英格兰以来，面对来自英格兰的入侵就成为苏格兰永恒的主题，苏格兰不得不将主要国力消耗在与英格兰的战争上，虽然苏格兰“光荣”地存在，但其民众的日子并不好过。苏格兰高地阳光少，多风雨，自然条件差，在农业时代属于较为贫瘠的地区，在这样的土地上，苏格兰民众不得不将可怜的产出长期消耗在战争上，百姓生活很艰难。

李丽颖表示，在18世纪初，苏格兰其实也可以选择与英格兰结束王位联合，回到完全独立的状态，但这样将不得不面临来自英格兰的经济制裁和武力威胁。因为当年为了对抗英格兰，苏格兰选择与法国结盟。英格兰和法国隔海相望，由于苏法成为盟友，理论上讲，法国军队可以随时出现在英格兰的土地上，这让英格兰人如坐针毡。可以说，在经历英法百年战争及苏法结盟后，英格兰努力北上的目的已从最初纯粹的领土扩张转变为拆散苏法联盟，然而，无论是亨利七世主动将长女嫁给苏格兰国王，还是亨利八世火烧爱丁堡，这一目标最终都没有达成。

继英格兰之后，苏格兰也进行了宗教改革运动，以此为契机，年轻的伊丽莎白女王最终完成了其父亲亨利八世和其

祖父亨利七世的心愿，使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关系化敌为友，而她在 1603 年去世后斯图亚特王朝继位，实现了苏英王位联合。英格兰对于王位联合非常满意，一是通过共主国王的形式，英格兰基本控制了苏格兰的内政外交，不再担心苏格兰会与法国再度结盟对抗它；二是英格兰随时可以以双方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国家为名，阻止相对贫穷的苏格兰染指其经济利益。然而，情况在 1703 年至 1704 年间发生了变化，议会在苏格兰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超过了共主国王，成为苏格兰的权力主角，这也意味着英格兰已无法再通过王位联合的方式控制苏格兰，而此时的英格兰与法国正在进行激烈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为了避免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苏法联盟打击英格兰的情况重演，英格兰最终决定，通过与苏格兰议会合并的方式消除苏格兰的独立。与此前对英苏两个王国合并持消极态度不同，这时的英格兰不仅主动要求与苏格兰合并，还动用经济和武力方式威胁对方。

如果当时苏格兰选择独立而非合并，那就只能再次迎来战争，殃及苏格兰人民。因此，苏格兰议会最终决定，与独立主权相比，人民的安定、繁荣更值得追求，从而同意与英格兰合并。宗教在当时的国家生活中仍是较敏感的问题，在合并过程中，为了消除苏格兰长老制教会的疑虑，最终以法案的形式确立了安立甘宗和苏格兰长老制教会在联合王国内的相互独立性，联合王国国王及议会无权对苏格兰宗教作任何改变，并且每任国王在加冕时都要对此宣誓。英苏两个民族能以这种方式解决合并过程中遇到的宗教问题，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值得称道的。

李丽颖认为，苏格兰政治家最终为了苏格兰的繁荣安定而放弃国家主权，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任何理论、任何主义都是为现实服务，在不侵犯其他民族利益的前提下，使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民族主义就是好的，民族主义的终极追求应是人民的幸福。当年决定合并的是苏格兰议会，其成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上层，体现了一定的上层意志，尽管当前决定是否与英格兰分离的是苏格兰人民，但苏格兰上层精英同样有义务和责任从整个民族的利益角度出发，做出应有的选择。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晓律的发言题目为《“无事生非”的苏格兰独立与英国脱欧》。他表示，将两个似乎并不相关的议题集中讨论，一是它们都与英国有关，也都发生在当下的英国；二是两者之间的触发因素和后果有很多类似之处。

苏格兰与英格兰在同一岛上，语言都为英语，且双方合并已有 300 余年，在这一过程中都获取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红利，民众交往没有任何障碍，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完全融合在一起，英国政府甚至还有意无意地鼓励苏格兰保持某种民族风情，以增加其文化的多样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融合的典范，却在学界公认最稳定的民主宪政基础上掀起了所谓的苏格兰独立运动，且声势越来越大，甚至还差一点成功，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难以理解。

与苏格兰独立事件类似，英国脱欧本以为只是一场闹剧，没想到却成功了。尽管很多学者分析出若干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原因，但为什么事前人们却意识不到这些原因？因

此，将上述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分析，旨在讨论以下几个问题：全民公投的含义与功效；政治家可以操控的权力平台边界；民族研究的终极目标；现有国家法理性与政治性边界。

陈晓律指出，首先，英国脱欧与苏格兰独立都是以全民公投的形式决定，因此不能不对全民公投这一看似程序正确，法理充分且各方面理由都“高大上”的方式进行性质上的界定。个人认为，全民公投是一种“脑残”的政治程序设计，是政治家试图推脱自身责任的典型做法，也是忽悠民众为自己标价以出售自己的做派。它并非是民主投票的另一种形式，其初衷或许是受古希腊直接民主的影响，但在现代社会，在投票人数上百倍倍增，社会的多元与经济的变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还试图东施效颦，就未免可笑了。从实践看，这种全民公投几乎都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及民众的心理裂痕。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保持清醒，是厘清很多复杂问题的前提条件。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民选政治家权力的边界。民选政治家的权力在宪法和各种行政法规中本来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果一意孤行甚至会遭到弹劾，但对于政治家滥用“民主”的权力却似乎没有一个明确说法。这是一个新问题。因为政治家的权力可以被限制，但很难提前限制他“滥用”民主的权力。英国最近一次灾难性的公投就是卡梅伦滥用民主权力导致的恶果。这并非西方制度的独有现象，很多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比如第三世界的很多政客，也常常通过各种方式操纵民意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由于制度设计本身有缺陷，政治人物的权力空间边界模糊，随意性强，很少有人去关注

类似的现象并进行研究，但英国是学界公认的成熟的宪政国家，民主制度的运行也已经历了很长的历史阶段，却还是出现了以“民主”名义吃饭砸锅的现象。因此，如何在民主平台上限制政客们的“民主权力”，避免国家分裂或解体，应成为学界关注的新热点。

第三个问题涉及民族研究的根本目标。国外的民族研究从其研究的后果看，一般都挑起了新的民族纷争，甚至导致了现有国家分裂。不少专门研究苏格兰问题的学者对苏英关系进行过非常深入和详尽的探讨。1707年苏格兰议会解散，之后加入新的不列颠议会，苏英双方合作愉快，并且由于工业革命的爆发而充分分享了发展红利，但由于种种原因，解散了近300年的苏格兰议会于1999年又重新出现在爱丁堡。按英国学者的说法，它标志着苏格兰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于是人们要问，这是一个什么阶段？苏格兰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如果是历史的进步，那么现在的分裂又是什么趋势？如果说分裂是历史的倒退，那么对学界而言，有些问题就值得思考，那就是所谓的民族研究，也即苏格兰研究的学者们的学术贡献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效果。虽然对学术研究的效益评估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从事某一民族研究的学者总是很难完全公正或超脱，情不自禁地将自己带入所研究的对象中，最终成为制造民族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相关研究如果与某种社会情绪产生共鸣，其后果更是微妙。由此看来，各类研究苏格兰的论文和专著的问世，都刺激着社会去关注苏格兰的历史问题，

关注苏格兰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问题，以及其独特的民族性在这种发展中的价值问题。

苏格兰之所以无法独立撑起自己发展的天地，只能成为联合王国的一个部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受到了英格兰的制约，而北海石油资源的发现，更是让一些苏格兰人觉得自己吃亏了。与此同时，政治上的竞选机制无限放大了这些裂痕，任由政客们操纵。于是，苏格兰独立就自然从无事生非变成弄假成真了。尽管目前独立还遇到一些障碍，但这种趋势一旦形成就很难扭转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现有国家的法理性和政治性的边界问题。这似乎不应成为一个问题，但一个国家的存在很多时候取决于法理之外的因素。即便是美国这样一个现代超级大国，其民族属性、疆土乃至制度，都是在激烈的内部冲突和外部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二战后国家数量不断增多，一定程度上是以现有国家的分裂为代价，因此现有国家都反对这种趋势，但国家的分裂和增加的趋势依然无法阻挡，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但要特别强调的是民族自决的原则。这一原则本来对二战后非殖民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时过境迁，其负面效用已越来越明显。回顾历史不难看出民族自决原则历经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从法国大革命最初的渴求自由而发展起来的民族自决，到一战结束后威尔逊十四点计划的民族自决原则，延伸至大西洋宪章中提出的相关主张，最后在 1952 年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和民族自决权》的决议，要求各成员国“支持一切人民和民族的自决原则”。然而，民族自决原则从一开始就隐藏着难以回避的悖论：自

决必然导致原有国家或统治体系的解体。从殖民状态下独立固然理直气壮，但从现有国家的框架中分离出去就成为令人棘手的问题。因此，解体或分裂到什么单位为止，或者何人拥有分裂和自决的解释权，是一个始终没有解决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英国是一个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这使得其在防止国家分裂的机制上存在重大缺陷。不过，即便有成文宪法，英国对于民族自决似乎也很难有效应对，因为从英格兰发展到不列颠帝国，然后又退回到英伦三岛，几个世纪以来的大起大落，不仅他人不知道其最后边界应该在什么地方，恐怕英国人自己也有些糊涂。所以，需要用什么样的理论来解决这一难题应是学界继续关注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未来问题。尽管尚未有理论上的突破，但人们也应具备起码的常识：当有人一再强调民族自决原则时，人们必须多一个心眼：这家伙又要挑起动乱了。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济时围绕《苏格兰二次独立公投威胁下的英国“软脱欧”选择》主题进行发言。他认为，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有着复杂和深远的前因后果。众多苏格兰人在独立公投中选择“留英”是以英国“留欧”为前提的。而2016年英国脱欧的结果，又使得苏格兰独立议题重新浮现，并与英国脱欧进程纠缠在一起。英国脱欧的最终安排、脱欧后英国的状况对苏格兰问题都有着重大影响。

美国学者迈克尔·赫克特在《遏制民族主义》一书中提

出，在多民族国家中，直接统治和文化同化形成了“国家建设民族主义”，与之相对应的是外围民族主义。并非直接统治都会导致民族主义，只有当直接统治不能同化国内的民族，导致民族与治理单元边界不一致时，外围民族主义才可能出现。运用国家治理角度所生发的直接统治和文化同化导致外围民族主义这一分析模式，有助于剖析苏格兰独立运动的内在动因。

从英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危机与苏格兰独立公投二者关系看，首先，英国议会通过各种立法对地方政府体制和运作进行规制，导致英国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大中央集权色彩的国家。中央政府对地方有生杀予夺大权，有的地方政府因为伦敦的法律会被取消或合并。即使在苏格兰实现部分自治，成立了苏格兰议会和政府后，苏格兰的大政方针仍要仰仗英国政府，这让部分苏格兰人心生不满。其次，在文化同化方面，英国政府并未积极主动地推动苏格兰的文化同化，从而使得苏格兰的传统和文化长期保持了其独特性。尽管苏格兰已融入英国 300 多年，却有 500 年的与英格兰分立和战争的历史。二战后苏格兰的民族认同逐渐强化，这为苏格兰民族分离运动提供了文化心理基础。第三，资源分配矛盾和政党政治成为民族分离的催化剂。上世纪 60 年代北海油田被发现，很多苏格兰人立即提出“这是苏格兰的石油”。在这个问题上，苏格兰民族党的崛起与之脱不了干系。

对于苏格兰独立公投的教训，李济时指出，卡梅伦政府之所以同意授权苏格兰组织公投，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和特殊的背景。一是在民主的话语体系下，公投具有无可比拟的合



法性。二是卡梅伦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支持苏格兰独立，反而是为了遏制住 SNP 的分离主义势头，因为在 2012 年，尽管 SNP 在选举中获得广泛支持，但民意调查表明，苏格兰独立的支持率很低，只有 20% 多。因此，卡梅伦希望以是否赞成独立这样一个简单问题尽快举行一次公投，而以当时的情势判断，独立选项肯定会被绝对优势所否决，这样 SNP 就再也没有理由去违背民意鼓吹独立，只能接受有限的自治。尽管后来独立公投的结果表明卡梅伦的决定是冒险之举，但他的决定也是当初的动机和形势使然。三是卡梅伦希望避免北爱尔兰式百年流血的情况再现。英国历史上从北美殖民地独立到爱尔兰独立，再到北爱尔兰内战，民族问题一直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伤痛。自 1707 年正式联合以来，苏格兰民族主义浪潮总体上比较温和，但在 20 世纪后期重新崛起，如果采取强压手段，难免不会引发新的暴力反抗。

对于英国脱欧对苏格兰独立的影响，李济时表示，由于超过六成的苏格兰人主张留在欧盟，所以脱欧的结果造成亲欧派苏格兰人的强烈不满，带动苏格兰人对独立的支持率上升到 45%。但悖谬的是，苏格兰独立支持率上升，SNP 的支持率却下降了。在脱欧公投结果出台后，SNP 一方面威胁举行二次独立公投，一方面试图影响英国政府采取“软脱欧”，至少使苏格兰继续保留在欧洲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之中。尽管 2017 年大选受挫后，斯特金曾决定将公投计划搁置，但在此后的脱欧进程中，其又不时拾起独立公投这一“金箍棒”。尽管特蕾莎·梅政府的最终方案被认为是“软脱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和苏格兰人的不满，但英国脱欧对苏格兰

民意的影响仍有重大变数。

鉴于 2014 年苏格兰独立公投险些造成国家分裂，英国政府不可能再次授权苏格兰举行二次公投。从苏格兰方面看，尽管独立倾向的选民仍很多，但其比例始终面临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即使举行二次公投，也存在很大的失败可能性。所以，SNP 也不敢轻易推出新的独立公投计划。即便如此，苏格兰独立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尤其是脱欧的前景仍不明朗，其对苏格兰民意的影响仍有重大变数。

第二阶段的发言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孙坚开始，她的主题是《公投视角下的苏格兰分离运动探析》。

对于苏格兰独立公投的出台及影响，孙坚表示，在上世纪 90 年代前，SNP 对苏格兰独立的路径并没有确切概念，萨尔蒙德执掌 SNP 后，逐渐在党内推动通过多重公投的方式决定苏格兰的宪政未来，将“独立”建构为一个可信任的宪政选项。当时 SNP 对独立的一般认识是，通过其在英国议会获得多数苏格兰席位，获得进行独立的民意授权，接下来是与英国政府进行“分家”协商，之后便可以通过全民公决完成最终独立。这一路径是乔·米尔肯斯所说的“多数—谈判—公投”的模式。鉴于 SNP 在苏格兰政坛中的少数党地位，想要获得大部分议席几乎不可能，所以这种模式的操作性很弱。1999 年苏格兰议会建立后形势出现了质的转变。SNP 通过苏格兰议会选举获得执政权的机会大大增加，他们放弃了获得多数选票即等同于获得独立授权的传统立场，转变为先争取在苏格兰执政，在执政期间推动公投，在公投后进行独立谈判。即独立进程的三阶段转变为“多数—公投—谈判”的模

式。

2011年，SNP以多数派身份上台后，公投议题再次被推向前台。英国政府无法忽视苏格兰独立诉求的发展，很多英国人认为，SNP在苏格兰议会中获得过半数议席，证明他们获得了大部分人的授权，即使没有立法权威举行公投，至少在道德上拥有该权力。对于SNP政府来说，他们逐渐意识到苏格兰议会在立法权上存在局限，公投立法的制定及举行会受制约。为了避免公投法案被最高法院否决，苏格兰政府只能与英国政府合作，寻求解决独立公投法理欠缺的解决方案。

2012年1月，关于苏格兰独立公投的咨询性文件《苏格兰的宪政未来》出版，表达了英国政府对苏格兰独立公投的法律立场。随后不久，苏格兰政府也出版了相关的咨询性文件。同年10月15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和苏格兰首席大臣萨尔蒙德签订了关于举行苏格兰独立公投的“爱丁堡协议”，苏格兰议会被赋予举行公投的短暂权力，公投的选项只设置两项议题，时间定在2014年结束前。

经过独立和反独立两派阵营的激烈竞选，2014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充分调动了选民的积极性与参与度。数据显示，此次公投共有84.6%的选民参加投票，在对“苏格兰是否应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回答中，55.3%的投票者选择了否，44.7%的投票者选择了是。公投的结果得到了苏格兰和英国双方政府的认可，苏格兰独立的议题本应终止。然而，随着SNP在公投后实力得到增强，在议会选举中表现强劲，再次举行独立公投的议题逐渐浮出水面。SNP在2016年苏格兰议会的竞选纲领中，提出将推动再次举行独立公投。

孙坚认为，公投作为直接民主的一种形式，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逐渐被英国宪制接受，成为代议制民主的有力补充。英国宪政的一大特色是因循惯例，然而对公投是否应成为惯例，英国学者存在不同意见。总体而言，苏格兰分离运动经过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及独立公投两个阶段。实现分权后的苏格兰分离进程发生了质的转变，苏格兰独立从分离主义者遥远的民族梦想转变为真切的政治进程。苏格兰独立公投的举行无论是对苏格兰分离运动还是对西方相似民族的发展均有重要的影响。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李冠杰围绕《SNP 与当代苏格兰政治变迁》主题进行阐述。

据介绍，SNP 正式成立于 1934 年，得益于 1997 年英国开启分权进程，SNP 不断壮大，从适应分权框架逐步转变为坚持走独立之路，进而成为苏格兰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大体上看，SNP 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失落时期（1999—2004 年）、崛起时期（2004—2014 年）和守成时期（2014 年至今）。在 2016 年苏格兰议会选举中，SNP 获得 63 席，议席未过半数，虽仍保住第一大党的位置，但已过巅峰期，且独立的政治目标短时期内无法实现，SNP 需要寻找新的目标和方向。

李冠杰认为，SNP 虽已执政了 11 年，积攒了丰富的执政经验，但该党在政治上仍面临诸多难题。第一，坚持走独立之路是 SNP 的政治目标，但受制于法理和英国政府因素，短期内苏格兰无法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如何在独立目标和其他政策目标上进行平衡，是他们面对的主要难题。第二，苏格兰采取的是以简单多数制为主、比例代表制为辅的混合选

举制度。通常情况下，这种选举制会造就联合政府或少数派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SNP 的发展潜力。在未来的执政中，SNP 在独立之路上会遭遇统一主义政党的联合抵制，采取何种措施保证其长期执政，是 SNP 面临的制度问题。第三，苏格兰既不是英国的殖民地，也没有遭受民族压迫，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受益颇多，但在当前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坚持走独立之路是否符合苏格兰的利益，是 SNP 必须慎重思考的关键问题。

李冠杰表示，英国脱欧将是影响苏格兰政治发展的关键变量。从时间节点看，正式脱欧是在 2019 年 3 月，过渡期结束是在 2020 年末，新一届苏格兰议会选举设定在 2021 年，SNP 政府必然会亲身经历英国脱欧的全过程。摆在斯特金政府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妥善处理苏格兰与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从当前苏格兰政府的立场看，苏格兰需要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其理由是，英国脱欧改变了 2014 年苏格兰独立公投时的政治环境，苏格兰人民在脱欧公投中选择留在欧盟，英国脱欧违反了苏格兰人民的意愿，所以必须再次给苏格兰民众表决机会。从当前英国中央政府的立场看，当务之急是在维护英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顺利脱欧，苏格兰如若再举行独立公投必须等到英国脱欧之后。总体上看，机会似乎站在了 SNP 这边。一方面，英国脱欧为 SNP 提供了推进独立的理由，短时期内让 SNP 重新燃起了民族独立的希望；另一方面，为了应对议席数下滑，SNP 必须借助英国脱欧充分造势。可以说，未来几年英国脱欧仍是影响苏格兰政治发展的关键变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傅聪发言题目是《英国脱欧背景下苏格兰的独立运动》。

她指出，争取民族独立的分离运动通常会从文化、经济和政治三个方面构建民众对独立的支持。文化因素方面，苏格兰的民族认同从中世纪起即在不断构建，即便在与英格兰合并之后仍得以保留。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政治和社会结构、独立战争留下的民族遗产，苏格兰人塑造了自己的民族国家。经济因素是影响公投结果的重要变量。首先，撒切尔夫人的去工业化政策成为推动苏格兰独立走向高潮的催化剂；其次，保守党 2010 年以来推行的紧缩政策也让在苏格兰占大多数的左翼政党支持者非常不满；再次，苏格兰政府与英国政府在北海油气田收益分配问题上一直存在矛盾。政治方面，推动独立公投的政治诉求依然适用。2014 年苏格兰独立派提出的诉求主要包括全面的经济、社会、政治、外交和军事自主权；解决民主赤字问题；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成为欧盟的一员。此外，新的重要变量是苏格兰在 2016 年“被”退出欧盟。英国脱欧公投再次凸显苏格兰的民主赤字问题，也让苏格兰的欧盟梦破灭。对苏格兰民族主义者来说，脱欧再次证明了只要仍是英国的一部分，苏格兰就可能永远处于其民主意愿被他人否决的风险中。“被”脱欧成为苏格兰独立派推动二次公投的有力武器。

傅聪说，后脱欧时代英国的经济社会治理、政党政治都是观察苏格兰独立运动时应考察的变量。首先，从苏格兰独立运动的历史发展看，影响苏格兰民众支持独立或者统一的基本动因有二，一是苏格兰的民族认同，二是对苏格兰独立

后的经济预期。苏格兰的民族认同至今已延续千年，而对不列颠的身份认同则是自《合并条约》以来延续至今的。相对于文化认同等较为抽象且于潜移默化中发挥影响的因子，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则是可以切实感受并进行理性预估的。当前，英国处于从欧盟退出、重新制定发展战略的时期，英国中央政府和苏格兰政府的经济社会治理绩效将会对未来苏格兰独立的走向产生巨大影响。其次，分权既是英国宪政对苏格兰民族意识形态演变的一种回应，同时也对英国未来的政治生活构成了挑战。应对苏格兰分离运动，以分权为核心的宪政改革的出发点是顺应、平复苏格兰的民族主义，但其不断的反馈循环却隐藏了国家分裂的潜在风险。再次，政党政治是苏格兰分离运动发展中的重要因子。在苏格兰议会中，SNP 取代了工党的地位，在全国议会中，SNP 的影响力也开始超越工党。总体看来，在保守党执政的背景下，苏格兰民族主义势头会较为强劲，在工党执政的背景下则趋于平稳。SNP、工党、保守党作为苏格兰地区影响力最大的三个政党将会在苏格兰独立的道路上形成强力的制衡。最后，当前脱欧背景下的苏格兰民族主义回潮与 2014 年独立公投时相比，独立阵营增添了一些新的支持者。2014 年独立公投时，英国所有的建制派，包括主流大党、金融机构、大型企业和媒体都坚定地反对苏格兰独立，但这次在英国决定脱欧后，苏格兰工党和苏格兰自民党都支持斯特金直接参与脱欧谈判以便苏格兰制定未来的战略。另外，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也更愿意看到一个加入欧盟的独立的苏格兰国而非退出欧盟的英国。尽管这些支持者各有其动力和诉求，但不可否

认它们是苏格兰独立路上的新变量，将产生新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中国社科出版社编辑郭泉以《两个“联盟”与 SNP 的选择》为主题进行发言。他认为，自 SNP 建立以来，其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经历了“亲欧-疑欧-再亲欧”的演变过程。作为一个以独立为目标的政党，SNP 对欧态度从根本上而言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SNP 将英国与欧洲视为苏格兰的两个“联盟”，在其对欧态度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在两个“联盟”、两种身份中进行权衡与选择。

SNP 对欧立场主要经历了三次明显的变化。第一次是从 SNP 建立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建立之初，SNP 是英国和苏格兰内部反欧派的主要代表者。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SNP 由此前的亲欧态度转向敌对态度，开始质疑一体化进程对苏格兰的价值，这种变化使得 SNP 在 1975 年留欧公投中站在了反对面，并在 1979 年分权公投中试图推进自己的设想，结果是遭遇公投与大选的双重失败。

第二次变化由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苏格兰实现分权，SNP 的亲欧立场得到回归。进入 90 年代，SNP 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转变基本完成，1992 年其竞选纲领中正式确立了“在欧洲中独立”的基本方针。就苏格兰社会而言，人们也开始相信苏格兰如果能够成为独立的欧共同体成员，其利益就能得到更加充分的代表，SNP 的“亲欧”形象也由此基本定型。

第三次变化发生在苏格兰分权后，SNP 取得了执政地位，其对欧立场由热情亲欧转向稳重务实，并且基本上完成了对



欧政策框架的制定。随着分权进程的继续展开，SNP 经历了由在野党向执政党地位的转变。这种变化一方面使得他们将主要精力转向了苏格兰内部事务的治理；另一方面又为苏格兰对欧政策的成熟准备了条件。在经历了两次公投后，其对欧立场进一步得到巩固。

郭梟指出，影响三次变化的主要因素是 SNP 自身的政策取向、英国国内政治发展与欧洲一体化发展三个方面，SNP 在苏格兰政治中的位置与取向为选择对欧立场奠定了基础，而英国国内政治发展与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形势赋予了 SNP 对两者的不同理解，由此造成了 SNP 不同时期态度与立场的差异。欧洲则是 SNP 实现独立目标的策略性工具。

随着“在欧洲中独立”路线的确立，SNP 选择了增强苏格兰的欧洲身份从而拉开与英国的身份差异，为此选择了公民民族主义、对移民开放、社会包容与多元文化主义等政策取向，在价值理念上向欧盟靠拢。2014 年苏格兰独立公投中留英派取得了最后的胜利，SNP 通过公投推进苏格兰独立的首次尝试以失败而告终，但之后其却在 2015 年的英国大选中获得了苏格兰议会几乎所有席位，一跃成为英国第三大政党。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以脱欧派的胜利告终，这一结果给 SNP “在欧洲中独立”的政策带来了巨大威胁，公投之后 SNP 寻求能够继续留在欧盟框架中的方案，斯特金政府不得不以再次发起公投作为保障苏格兰在英国脱欧过程中利益的筹码。

郭梟表示，近年来全球政治中频繁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实际上并非是对全球化的全盘否决，而是国家对区域经

济一体化和全球化呈现出的问题的应激性调整，一些被掩盖的问题和内在的悖论逐步显现：为什么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进程反而推动了地区分离主义的发展？为什么欧洲超国家一体化进程不能遏制欧洲的民族分离势力？如 SNP 之类的分离主义政党为何倾向于亲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所在国更热心于欧洲一体化？他认为，首先，一体化的超国家性质及主权让渡进程对传统的国家主权构成了挑战；其次，一体化进程降低了地区分离主义的成本；第三，一体化过程中欧洲认同构建的滞后为分离主义提供了更多话语空间。

一体化与分离主义之间的悖论将在较长时间内困扰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尤其是在民粹主义阴影持续笼罩的情况下，采取亲欧立场、从话语上接受欧洲认同理念的分离主义势力反而成为反对民粹主义的力量，这种微妙的情境也使得欧盟在对待相关问题上必须更加谨慎。

郭梟最后表示，尽管地区分离主义政党对欧洲一体化具有更强烈的热情，并且在实践中拥护欧盟倡导的价值理念，这种支持对于被不确定性与民粹主义深深困扰的欧洲而言无疑是弥足珍贵的，但欧盟面对这种情势却无法有效回应，政府间主义似乎仍是欧盟前进的现实方向。无论对 SNP 与苏格兰，还是对欧盟与欧洲而言，这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也将会是决定苏格兰未来的一扇窗口。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胡莉最后发言，题目为《苏格兰民族党的“脱英”计划》。她认为，英国是不愿苏格兰离开的，苏格兰大部分民众也不愿“脱英”，之所以苏格兰独立问题持续存在，最大的动因是苏格兰民族党。

胡莉表示，在 1707 年英苏合并后的 300 多年中，苏格兰一直认可自己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苏格兰与英国的问题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出了问题，只不过这个地区有特殊性，那就是它有一些独特的苏格兰民族认同。事实上，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苏格兰民族运动兴起至今，某种程度的自治才是苏格兰的主要诉求，英国政府也付诸过实践。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布莱尔政府再次推出分权政策，苏格兰议会顺利建立，苏格兰与英国的问题相对缓和。但是，鼓吹独立的 SNP 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他们借助苏格兰对地方自治的某种需要，抓住一切机会推行独立计划。

1934 年 SNP 成立时，将发展目标由最初的“独立”改为“在苏格兰能够作为英帝国内与英格兰享有同样地位的组成部分，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进民族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苏格兰自治。”然而，不久后由于发展惨淡，SNP 将目标改回“独立”并将其写进党章。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SNP 借助英国经济发展受挫、北海油田发现、社会阶层变动等外部环境的变化大肆宣扬独立。当时，SNP 的独立计划是通过刻意的宣传挑拨苏格兰民族情绪，让苏格兰的民族认同冲击英国国家认同，从而为其独立目标所用，虽然缺乏真正的根基和合理性，但经过炒作，民族党获得很大发展，独立也被人们所知。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SNP 继续借助外部条件变动进一步宣扬独立。此外，在 1979 年分权公投失败后，SNP 看清了独立计划在苏格兰不太可能实现，为此他们采取了新对策，比如对于这一时期的苏格兰自治运动，民族党最初拒绝参与，但随着工党政府再次将分权提上日程，民族党又转变

立场，一方面宣传“分权走向独立”，另一方面却在 1997 年建立苏格兰议会的公投中站在工党一边。经过这一时期的宣传，民族党激起了苏格兰人的民族认同，不断冲击英国国家认同。

进入 21 世纪，SNP 以苏格兰议会为基地，大肆推进脱英计划。苏格兰议会建立后，苏格兰与英国关系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议会满足了苏格兰对地方自治的某种需要，随后十年里没有迹象表明分权将导致独立，反而呈现分权抑制分离的态势，民调数据也表明苏格兰人对进一步分权或独立没有更多支持。另一方面，SNP 借助一切机会裹挟着苏格兰走向独立的边缘，比如在 2007 年苏格兰议会大选时将执政目标与独立目标相分离，宣传独立只会通过公投的形式举行，让选民放心投票，如果投给民族党，会获得一个在联合王国内最能代表苏格兰需要和意愿的政府。结果，2007 年民族党击败工党，组建少数党政府，尽管选民并非因支持独立而选择民族党，但民族党上台后，民众就无法摆脱其“脱英”计划。2011 年苏格兰议会选举中，民族党赢得绝对多数席位再次执政，决心发起“多选项公投”，然而卡梅伦政府看准了大部分苏格兰民众不支持独立，只让其发起“独立公投”，而民族党又要求 16-17 岁的年轻人（该群体 70%支持独立）拥有投票权，由此一场向全民兜售独立，动员整个苏格兰“脱英”的公投出现了。

需要强调的是，2014 年公投结果表明，第一，苏格兰大部分民众不愿脱英，独立一直都是民族党的野心，从 20 世纪初至今，无论民族党如何炒作独立，都缺乏真正的基础和

合理性；第二，民族党的脱英计划已经披上了全民行为的合法性外衣，人们似乎忘记了脱英只是民族党的计划，而不是苏格兰人的选择。英国脱欧后，SNP 针对苏格兰大部分人反对脱欧，要求发起第二次独立公投，但民调显示大部分民众不需要也不支持，英国政府也表示“不是时候”，然而，民族党已经在苏格兰站稳了脚跟，党员人数超过 10 万，资金充沛。此外，支持独立与反对独立的数据较为接近，而英国脱欧前景、英国经济发展等外部环境又充满变数，这种情况下，未来苏格兰脱英或许已经成为一个可能选择。

在讨论环节，陈晓律表示，苏格兰脱英的确有相当大的可能性，从情感因素看，尽管没有进行公投，但双方在情感上已经埋下裂痕；从理性因素看，目前苏格兰脱英的形势很严峻，因为曾经面临的威胁已不存在，英国民众的心态已经发生变化，对于苏格兰的离开无所谓；第三，苏格兰独立后会有大批职位空缺，这也成为了一种助推力。目前看来，英国政治家是否有强烈意愿将苏格兰拉回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钱乘旦：我认为独立不一定是必然的，但有可能弄假成真。从制度角度看，公投决定是否脱英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一批人投票并不是针对“走还是不走”，而是对发起公投的人支持或反对；再比如本来双方阵营差距较小，但因天气等客观因素，最终结果受到干扰。所以目前来看，苏格兰脱英是存在可能性的。

孙坚：我想谈谈苏英关系中谁占主动的问题。1603 共主联邦建立后，分合的主动权在英格兰，当时英格兰并不愿合

并；到了 1707 年，英格兰对于合并的紧迫性很强，一是出于政治稳定考虑，二是出于军事因素考虑，主动权也掌握在英格兰手中。目前分合的主动权仍掌握在英国手中，但英国似乎没有保持国家统一的意愿，不知道未来会通过什么方式阻止苏格兰脱英。

高岱：孙坚认为主动权在英国，这是事实，但 1603 年英国王朝是从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来的，应该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不能简单地说英格兰主动。关于苏格兰议会的公投权力，有一个事实，2014 年公投后，威斯敏斯特已经表达过 10 年之内不再进行公投，也就是说苏格兰议会尽管有各种权力，但在重大问题上还是要受制于威斯敏斯特。所以从长远看，苏格兰有可能脱英，也有可能不脱英，要对所有因素进行全面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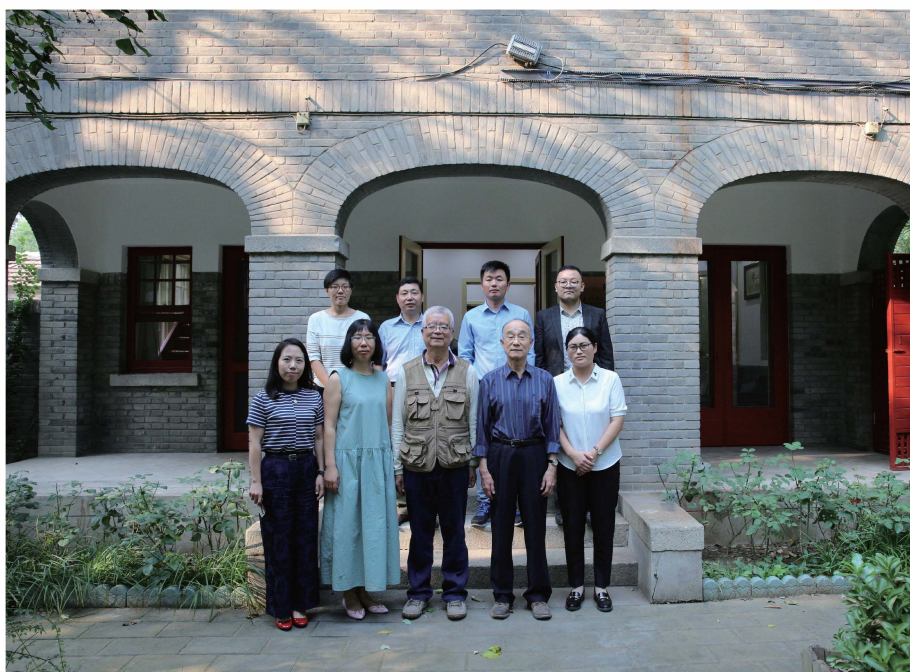
钱乘旦：有两位在分析苏格兰与英国的关系时使用了权力下放的概念，这是否是政治学界使用的概念？是否应该使用“分权”这个词？

李冠杰：我觉得权力下放这个词比较合适，因为当时英国与苏格兰也讨论了“下放”是针对某事还是指的一个进程，最后大家认为是一个进程，之后英国又下放了一些权力到苏格兰议会，如果使用“分权”，重点就在“分”上，表明分了之后这件事就结束了，英国给苏格兰分权后，苏格兰再向下分权，所以我觉得权力下放可能更合适一些。

钱乘旦：这可能涉及到汉语翻译的问题，英文是“devolution”，这个词在英国很早的历史中是没有出现的，只出现在涉及苏格兰的阶段，它实际指的是具体的现象，即

威斯敏斯特主权开始向两个部分输送，一是苏格兰，二是威尔士。“devolution”只是针对苏格兰和威尔士，理解为权力下放是不正确的。

讨论环节结束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对会议进行总结，他表示，大家的发言很精彩，讨论很深入，但仍有一些问题尚未涉及，比如英国政党、政客、政府和苏格兰问题的关系。苏格兰问题很重要，如果英国解体，会对世界格局会造成重大冲击，但目前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期待未来有机会再组织相关学术活动对此进行分析与讨论。



2018年9月14日于北京大学燕南园66号院